

论辛亥革命

吴玉章

论 辛 亥 革 命

吴 玉 章

人 民 出 版 社

论 辛 亥 革 命

吴 玉 章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发 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10月第1版

197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001·231 每册0.10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毛主席语录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
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有名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到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进入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说，都是导向这次革命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侵入中国的是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必须经过严重的社会改革，使自己资本主义化，才能同它相对抗。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曾经认为这种改革也可以用革命以外的其他方式，例如日本的方式，即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改良的方式来完成。但

是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除了用外国枪炮武装军队和办几个工厂以外，拒绝在政治上进行任何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就是清朝政府中当权的顽固派拒绝政治改革的坚决的表示。如果当时清朝政府在抵御外侮方面是坚决的，那末，拥护它的人也许要多一些。可是清朝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甚至无能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发动了反外国侵略的斗争。清朝政府不但不能给这个斗争以任何有效的支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它又屈辱地订立了《辛丑条约》，承认外国在中国有驻兵权，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以海关税和盐税作抵押，由外国派员监收。这样，中国不仅直接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威胁，而且还让它们干涉中国的财政收支。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这个条约当时特别使人感到愤慨。孙中山先生说，以前他奔走革命，人们把他看做危险分子，不敢同他接近；而在此以后，他就得到了很多的同情者，主张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广大群众爱国心的提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孙中山先生所鼓吹的民主革命会得到很多人同情呢？这是因为有了新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级。它的出现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纪初，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一个阶级了。

试看民族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吧。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间举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二家，资本总数为二、二七七万元。到一九〇六年，就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六家，资本总数为二、七〇〇万元。其中以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一八九六年全国纱厂十二家，其中华商七家；共有纱锭四一七、〇〇〇枚，内华商占二五九、〇〇〇枚；织机二、一〇〇架，内华商占一、七五〇架。就当时棉纺织业最发达的上海和江苏来说，一九〇二年上海共有纱厂十七家，纱锭五六五、〇〇〇枚；一九〇八年江苏共有纱厂二十三家，纱锭五八七、〇〇〇枚，织机三、〇六六架。缫丝业的发展也很显著。一八九五年上海共有缫丝厂十二家，一九〇三年增加一倍，丝机八、五二六架；一九〇九年增加到三十五家，丝机一一、〇八五架；一九一一年增加到四十八家，丝机一三、七三八架。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烟草、玻璃、机器制造等各种行业都开办起来了。

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当然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正因为不够，资产阶级就更有发展它的要求，对外国资本

的威胁更为敏感，对政治改革的关心也更为迫切。以修铁路为例。中国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并不认识修铁路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这次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人的鼓吹和自己的觉悟，懂得了修铁路的重要性。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铁路。清朝政府早已债台高筑，哪里还有许多钱来修铁路呢？要修铁路就只有借外债。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决定成立铁路总公司，派亲美的大买办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主张“借美债，用美匠”来筑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海港和争夺势力范围，铁路投资更成为它们用来巩固在华势力范围的工具。这个借外债筑路的办法，引起了列强的竞争，也引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对。湖南省有个资本家名叫禹之谟，是长沙的商会会长和教育会会长，一九〇〇年参加过唐才常在湖北的起义活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六年在长沙开工厂，和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清朝政府在一九〇六年夏天把他逮捕起来并在一九〇七年初把他绞死了。他就是资产阶级中反对借外债筑路的一个积极的鼓动者，在做商会会长时期如此，在牢里也如此，并且把反对借外债筑路作为他的遗嘱。

这个时期，“收回利权”的呼声响遍全国。江浙人民

为争回苏杭甬铁路建筑权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得到胜利，更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对借外债开矿也是在当时资产阶级中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山西曾经有些人自动筹集资金，从英国人手里把矿权赎回来。反对借外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事件，其他各省也曾陆续发生。

在这个时期里面，爱国运动差不多是一触即发的。一九〇四年冬和一九〇五年初，由于反对美国要求续订中美华工条约，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十多个省的大小城市。

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外的，这就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是从小商人出身，甚至有的是从工人出身的，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比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

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就是从华侨里面开始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他的哥哥早年到檀香山经营畜牧业发了家，他小时候就到那里依靠他哥哥读书，所以他本人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他所建立的兴中会，华侨占会员总

数百分之七十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华侨资产阶级。他后来在沿海各地从事武装起义，也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

这些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确实是要求政治改革的。但是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当时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革命派所以对革命具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化。

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一年间的社会状况反映出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是很低的。但是在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前，不少人还可以勉强地用各种方法来维持生活。例如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很久以来，都是男耕女织，兼营副业或手工业，在封建统治下过着十分低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一、二十年间，外国人还为上海和广州附近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普遍而感到震惊。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农村出产的土布就开始为廉价倾销的洋货所代替。其他如丝织品和瓷器本来都在出口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时却都因出口的减缩和入口的增加而衰落下去。这样，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活路少了，同时清朝政府的捐税和地主的剥削反而加重，他们的生活自然更为困苦了。所以在这个时期

以“抗捐”、“抗税”、“抢米”一类口号发动起来的农民暴动，一年年有加无已。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仅长江中下游所发生的“抢米”、“抗捐”事件，就有八十多起。一九一〇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参加的群众都有几万人。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很早就参加过革命斗争。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矿工人六千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来响应资产阶级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运动。此外，工人为改善本身生活条件曾进行过多次罢工斗争。

这个大动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趋瓦解。在这个大动荡中，不仅许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起来反抗，而且也有不少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表现不安，想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当时封建主义已经毫无出路了。要找出路只能跟着资产阶级跑。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不是变成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就是变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信徒。

正是由于全国人民日益明显地倾向于革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小规

模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分子组成的，成分不一，但都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九〇五年，这些地方性的小团体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联盟，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除了推翻清朝政府以外，还主张建立民国，并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就是辛亥革命的纲领。

二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年间，革命形势已经相当高涨了。从人民方面来说，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从统治者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倾向于革命；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就力图缓和革命，以便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所以清朝政府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不能象戊戌政变前后那样顽固了。它陆续颁布了一些实行改革的命令。这些改革包括：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裁冗员、设立商部并对民族工业采取保护政策等，都是康有为等人在戊

戊戌时期求之不得的。但此时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比戊戌时期大为提高，清朝政府尽管实行了一些改革，也不能使人们感到满意。清朝政府迫不得已，在一九〇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表示同意立宪；一九〇八年宣布筹备宪政期间为九年，到一九一七年完成。一九〇七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宣布对兴办实业的人给以奖励：投资二千万元以上者赏一等子爵，投资十万元以上者赏五品衔。这些措施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并且许诺了更大的让步。

清朝政府所实行的和许诺的这些改革，引起和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的改革是虚伪的，诺言是靠不住的，必须推翻这个政府才能建立民主制度；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他们认为，清朝政府的改革尽管是虚伪的，诺言尽管是靠不住的，但是已经有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与其忍受革命的痛苦，不如用合法方式来争取政治改革的进一步实现。

当清朝政府还在拒绝改革的时期，革命派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且和立宪派有了意见分歧。到了一九〇五年前后，这种分歧越来越大。结果，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发生了分裂。

这种分裂在一九〇九年以后更加显著。因为在这个时期，清朝政府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谘议局，这是一种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资政院照规定设议员约三百人，其中一百二十五人由皇帝委派（其中王公世爵十人，宗室五人，中央各部院官员一百人，业主资产在一百万元以上者十人），另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本省议员定额十分之一，约一百六七十人。各省谘议局议员由各县选举，凡在当地办教育或其他公共事业三年以上的，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举贡生员以上出身的，曾任文官七品、武官五品以上的，在当地有五千元以上工商业或不动产的，都可以当选。按当时全国二十三个省区计算，共有议员一千六百七十七人。谘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预决算、税法、公债以及本省担任义务之增加等。这样的机关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参加进去了，有些人还被推举为议长。

全国各省谘议局的设立，除加深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外，还有两种作用值得注意。

第一，它具有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这个机关既是议会性质的，各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要求改革的人很多都被选进去了，就立即成了一个要

求政治改革的讲坛。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请愿立宪的运动也日甚一日，政治改革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结果，清朝政府只好继续让步，本来宣布在一九一七年实行宪政，此时又宣布提前四年，在一九一三年实行宪政。然而这种让步仍然不可能使人们感到满意，甚至谘议局的议员们也有很多人因为清朝统治者缺乏进行改革的诚意而失望。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反对借外债筑路的运动，山东、山西等省反对借外债开矿的运动，也都是在谘议局里面哄闹起来的。这些运动都关系到一般群众的利益，议员们越是闹得凶，卷入的群众也就越多。群众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他们既然参加进来，就把议员们的运动变了质，变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了。所以，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极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二，谘议局也起一种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参加谘议局的资产阶级分子多数是属于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民主改革，然而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改革。现在他们又同地主阶级的绅士们在谘议局里面形成一条要求政治改革的阵线，就势必要进而反对社会的民主改革了。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谘议局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

立宪派在国内所占有的巩固地盘，它使得革命派在革命爆发以后完全处于劣势。立宪派成了主人，革命派成了客人，而主人是同封建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可以对谘议局的作用作这样一种评价，即：它在革命以前，一方面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一方面因为要求政治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反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革命以后，它虽然竭力表示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但是因为它和旧势力在一起形成了对抗革命派的联盟，在实际上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

从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到这些团体的联合，建立起同盟会，这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把这个发展考察一下，就可以看见，它的成就主要是产生了一个共同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说了三件事：一、推翻清朝政府；二、建立中华民国；三、平均地权。其中，建立中华民国和平均地权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的贡献。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历来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人都以恢复明朝或者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一八